

【社会救助与福利】

# 中国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问题再反思： 一项关于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元分析

王燊成 杨永政

**【摘要】**正确认识福利依赖问题对于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筛选出的国内文献,运用元分析方法对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整体效应大小进行定量分析,并从数据、变量、模型、文章四个维度识别了以往文献产生差异化结论的潜在影响因素,重新探讨中国社会救助中的福利依赖问题。结果显示:社会救助与就业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其总体效应较小;就业的测量方式显著调节了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其他潜在调节变量则不显著。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救助存在福利依赖,但是程度并不严重。现阶段应着力改善社会救助体系以及规范劳动力市场,以降低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扩散和加剧的可能性。

**【关键词】**福利依赖;元分析;社会救助;就业;最低生活保障

**【作者简介】**王燊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 100089);杨永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社会保障研究》(武汉),2024.3.87~99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3 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级青年科研项目“数字经济发展中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贫困问题研究(2023QN054)”的阶段性成果。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复杂的实践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当年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sup>[1]</sup>。因此,在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实现福利给付增量提质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或者应对“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问题,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处理好这一议题不仅有利于发挥好社会政策的兜底功能,而且有助于在促进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提高分配

效率,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水涨船高”的内在关系。在社会保障的项目中,鉴于社会救助兜底的福利属性与功能定位,现有关于福利依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研究场域。

学术研究方面,1984 年 Charles Murray 在《失去的基础:1950-1980 年美国社会政策》中正式提出福利依赖的概念<sup>[2]</sup>,此后福利依赖逐渐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经典议题,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该议题进行了探讨。在中国,尽管带有反福利依赖理念的救助项目自古有之,比如缘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以工代赈”,但是真正围绕这一术语展开学术讨论主要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在该制度建立之初,就有文章指出,低保标准并非越高越好,应该明显低于个体经营

者的平均收入水平,以鼓励居民自食其力,减少“养懒汉”现象<sup>[3]</sup>。此后,随着低保的提标扩面以及附带福利的叠加,“低保金变成了养懒金”“低保养懒汉”“低保福利依赖”等词句不断出现在学术研究当中<sup>[4-7]</sup>。考虑到福利依赖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及过度的福利依赖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深入探讨福利依赖对于社会救助制度转型、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必要且重要的。

关于福利依赖研究,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福利依赖是否已经存在,后续一切关于福利依赖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都应建立在对该问题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然而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救助中是否存在福利依赖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无论是理论思辨文章还是实证分析文章,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严重。

## 二、文献回顾:福利依赖的三种争论

在西方,福利依赖最常见的测量指标是福利领取的周期,福利领取周期越长,个人或家庭的依赖程度越严重<sup>[8]</sup>。此外,个人或者家庭总收入中福利收入的比例是衡量福利依赖程度的另一常用指标<sup>[9]</sup>。在中国,除这两项通用指标外,多数学者主要从就业行为、就业意愿等指标测量福利依赖程度<sup>[10-14]</sup>。因此,在中国社会救助领域,关于福利依赖的讨论,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低保对象的福利领取是否对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们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强调福利对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认为福利依赖效应已经存在;二是否定福利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认为福利依赖效应不存在或存在条件不充分;三是认为福利与就业关系复杂,反对简单化判断是否存在福利依赖效应。

### (一)福利依赖已经存在

在21世纪之初,学者们主要基于调查数据的描述分析以及实地调研的直观感受认为福利依赖已经存在。蓝云曦、周昌祥发现低保对象找工作积极性不高,主观上不愿劳动,福利依赖问题已经产

生<sup>[15]</sup>。洪大用利用北京市民政局2003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尽管低保对象生活困难,但相当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就业意愿明显不足<sup>[16]</sup>。

此后,随着地方调查数据的涌现,研究者开始利用计量模型对福利依赖问题进行分析。王欣基于北京市宣武区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长期的福利救助会削弱贫困人员的求职意愿<sup>[10]</sup>。王增文基于中国16省37县市的社会救助对象抽样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家庭人均社会救助收入以及社会救助配套项目的享有对社会救助对象的再就业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sup>[11]</sup>。其另一研究利用倾向度匹配方法也发现,相较于非社会救助家庭,社会救助家庭的再就业意愿以及劳动供给行为显著减少<sup>[17]</sup>。慈勤英、兰剑基于2014年湖北省和辽宁省的调查数据,认为“救助依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因为从统计上来看低保救助福利显著增加了贫困人员失业的可能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再就业意愿<sup>[12]</sup>。冯帆利用南京市2018年2月27日的客观截面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同样发现低保金的提高会对再就业产生抑制作用,福利依赖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sup>[18]</sup>。

除了地方数据,一些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低保领取产生了明显的就业逆向激励。刘璐婵、林闽钢对民政部2013年城乡低收入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城市低保受助者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低,“养懒汉”问题已普遍存在<sup>[7]</sup>。姚建平基于2015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CLIFSS),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低保和医疗救助对城乡低收入家庭成员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up>[13]</sup>。刘一伟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享有低保的人员外出就业的概率要低于未享有低保的人员,低保存在“福利依赖”与“养懒汉”现象<sup>[19]</sup>。韩华为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

别策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论证,同样发现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sup>[14]</sup>。还有研究不仅在数据来源、模型方法等方面不断发展,对因变量的概念操作化也进行了创新。孙伯驰、段志民将平均就业时间作为就业参与的测量变量,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及PSM-DID方法,发现低保救助会减少农村家庭的劳动时间,因此存在显著的福利依赖效应<sup>[20]</sup>。

不过,相较于低保金,有研究认为真正逆向激励低保对象就业参与的救助福利其实是低保背后的各种专项救助<sup>①</sup>。黄晨熹基于上海市的问卷调查,发现附带福利是影响低保对象是否愿意工作的重要因素<sup>[21]</sup>。徐月宾、张秀兰指出,福利依赖并非因为低保标准过高,而是由于低保资格附带很多利益,一旦失去低保资格,家庭将面临很多风险<sup>[22]</sup>。面对各类附带福利的“诱惑”,低收入困难家庭往往通过各类方式降低收入水平,甚至采取不就业的方式来维持低保资格,从而不断享受附带福利<sup>[23-24]</sup>。

## (二)福利依赖尚未存在或条件不充分

遵循福利领取是否会抑制救助对象就业的逻辑,有研究基于调查数据强调中国福利依赖不存在或存在条件不充分。韩克庆、郭瑜基于北京等全国六省市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低保救助削弱就业动机的结论缺乏明显的证据支持,事实上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不仅就业意愿较强,而且还有较强的改变贫困的动机<sup>[5]</sup>。肖萌、李飞跃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2013年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低保金的领取时间,还是低保附带福利,对低保对象的就业均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低保对象就业参与的主要是因为就业能力不足以及市场就业机会的缺乏<sup>[25]</sup>。肖萌等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2014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市低保对象退保难与工作积极性下降无关,其中的主要原

因在于极为有限的低保金很难使被救助者完全依赖于救助<sup>[26]</sup>。徐月宾等利用在济南、长沙和包头三个城市收集的调查数据,按照不同的低保金对家庭收入的替代率进行模拟研究,发现福利依赖性问题被夸大了,许多低保受益人实际上从事非正式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工资很低),他们存在与健康问题和家庭需求有关的就业障碍<sup>[27]</sup>。马爽同样利用这套数据展开研究,认为调研数据不能支持制度性因素产生就业负激励的观点,救助水平较高的低保对象找工作的概率高于救助程度较低的低保对象,不过超过半数的低保户在过去的1年中接受过教育救助、医疗救助或者住房救助<sup>[28]</sup>。

也有研究者从侧面角度强调福利依赖的条件并不充分。例如,陈泽群基于对广州市低保对象及政府官员的访谈,发现低保金标准过低,不足以削弱低保对象的工作动机<sup>[29]</sup>。低保对象长期维持低保资格只是为了获取医疗、住房、教育等专项救助福利<sup>[30]</sup>。关于低保领取不会对就业参与产生逆向激励的解释,包括低保金水平低,公示带来的“羞辱感(stigma)”,严格的家计调查与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烦琐的申请程序,差额救济原则,自力更生与艰苦朴素的福利文化,“看菜吃饭”、量入为出、总量预先控制的弹性逻辑等<sup>[6][29][31-32]</sup>。

此外,有学者认为福利领取对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高琴等基于上海城市低保的研究表明,低保福利实际上有助于贫困家庭投资人力资本<sup>[33]</sup>,福利领取能够促进受助个体的生产能力并对其就业产生正向影响<sup>[14]</sup>。

## (三)对福利依赖的判断不应简单化

部分学者认为低保领取与就业的关系是复杂的,并非“救助会导致福利依赖,而就业能避免福利依赖”,即救助和就业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或替代关系<sup>[6]</sup>,因此对福利依赖的判断不应简单化。低保对就业行为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sup>[4][34]</sup>。有学者强调中国的福利依赖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福利依

赖,中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福利依赖主要是依赖福利资格而非福利水平<sup>[35]</sup>。低保制度所致的“福利依赖”是低保障水平下,居民为提高收入水平而弱化“正规就业”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慷慨的福利给付导致低保对象策略性降低劳动激励的一种生存策略<sup>[31]</sup>。因此,刘璐婵强调在研究中国的福利依赖问题时,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更适合中国的福利依赖概念<sup>[36]</sup>。

#### (四) 文献评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低保福利依赖话题保持很高的关注度,在数据来源、模型方法、指标选取上不断推陈出新。然而也正是因为学者们使用不同数据、模型方法、变量衡量指标,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判断福利依赖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在西方国家,福利依赖时常被新右派用来打击当代福利国家体制,具有较为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甚至带有“懒惰”的负面标签。鉴于此,对于福利依赖的判断需要慎之又慎,既不能夸大福利依赖的严峻性,也不能忽视福利依赖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对于中国社会救助的福利依赖问题进行再反思,并尝试对以往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进行“调和”,以期能够对这一问题得出更加全面、客观的结论,同时进一步探讨已有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使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不仅可以对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加权平均的效应大小(effect size),消除一些特殊的实证分析的偏差,还可以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识别出导致以往的实证研究产生不同结果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在全面深入研究和系统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元分析方法从总体层面对福利依赖问题存在与否做出判断,并找出造成现有研究结论差异的潜在原因。

#### 三、研究设计

知识的进步是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综合和积累,而元分析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sup>[37]</sup>。有学者将元分析定义为“一种以效应大小的形式综合实证

研究结果的定量方法”<sup>[38]</sup>。元分析可以被看作围绕特定主题对现有研究进行的系统的文献综述,但是与常用的文献综述形式相比,它以定量的方式总结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操作程序上遵循严格、固定的流程,因而是可复制的和透明的。此外,它侧重于分析效应大小而不是统计显著性,可以更精确和有效地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元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和医学等一些领域,但在公共管理和政策、政治学、社会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尚没有得到普及<sup>[39]</sup>。综合比较社会科学领域已有采用元分析方法的研究<sup>[40-41]</sup>,本研究选择Ringquist提出的元分析方法<sup>[39]</sup>。该方法的特点是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如相较于实验方法更多使用非实验的调查数据、经常汇报多个回归系数等),对心理学和医学中的传统元分析方法进行调整,并将其应用到社会科学。由于福利依赖的相关实证研究多采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且经常汇报多个回归系数,因此采用该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 (一) 文献检索与筛选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中以“主题”为维度开展中文文献搜索,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中以“abstract”为维度开展英文文献搜索。考虑到已有研究的质量及聚焦性,中文研究仅限于CSSCI(含扩展版)来源期刊,英文研究仅限于包含SCI、SSC的核心合集数据库来源期刊。对于中文文献,本研究选取“福利依赖”“救助依赖”“低保依赖”“低保就业”等检索词。对于英文文献,主要以三组关键词的组合形式进行检索: (“dibao” OR “social assistance” OR “social welfare” OR “welfare dependenc \*”) AND (“employment” OR “job”) AND (“China” OR “Chinese”)。此外,为了确保对文献进行全面审查,本研究不仅搜索上述数据库中的文献,还通过滚雪球(Snowballing)<sup>②</sup>、手动搜索、搜索认证、引用文章等方式确定其他来源的文献。文献检索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8月。最后只有符合以下标准的

文献才会被纳入元分析中:第一,属于定量研究;第二,文献的因变量包括一项或多项就业指标;第三,文献的自变量包括一项或多项福利领取指标;第四,文献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计算效果大小;第五,文献实证考察了中国社会救助(低保)的福利领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系列筛选,本研究最终获得符合标准的文献 26 篇。

## (二) 效应大小的计算

在元分析中,原始研究的系数通常要转化为效应大小(effect size)。所谓效应大小是被纳入元分析的实证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大小的标准化衡量结果,后文提到的 6 种方法都是标准化的具体方法<sup>[39]</sup>。用于衡量效应大小的指标有很多,如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效应大小(Pearson's  $r$ )、基于科恩的标准化均差的效应大小(Cohen's  $d$ )、基于风险比的效应大小(Odds ratio)。不同的指标适用的情景有所差异,如皮尔逊相关系数常常适用于因变量为连续性变量的情境,科恩的标准化均差常常适用于有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验研究,风险比常常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况。本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衡量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一些研究用是否就业这个二分变量来衡量就业这个因变量,但是仍然有很多研究将就业操作化为连续性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适用于连续性变量的情况,且二分变量的风险比可以转换为皮尔逊相关系数。第二,关于福利依赖的研究来自不同的学科,但这些定量研究基本上都汇报了社会救助与就业之间的回归系数,将它们转化为皮尔逊相关系数更为便捷。根据原始研究中不同的结果汇报方式,本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效应大小。

第一种方法:当原始研究汇报回归系数和标准误时,首先利用公式(a)计算出  $t$  值,然后利用公式(b)计算效应大小。 $b$  表示回归系数, $s$  表示标准误, $t$  为  $t$  检验统计量, $df$  为自由度, $r$  为基于皮尔逊相关

系数的效应大小。

$$t = \frac{b}{s} \quad (a)$$

$$r = \frac{t}{\sqrt{t^2 + df}} \quad (b)$$

第二种方法:当原始研究直接汇报  $t$  值,直接可以利用公式(b)计算效应大小。

第三种方法:当原始研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且汇报回归系数和标准误时,首先利用公式(c)计算出  $z$  值,然后利用公式(d)计算效应大小。 $b$  表示回归系数, $s$  表示标准误, $z$  为  $z$  检验统计量, $n$  为样本量, $r$  为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效应大小。

$$z = \frac{b}{s} \quad (c)$$

$$r = \frac{z}{\sqrt{n}} \quad (d)$$

第四种方法:当原始研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且直接汇报  $z$  值时,可以直接利用公式(d)计算效应大小。

第五种方法:当原始研究汇报的回归系数缺少标准误,且用星号标注显著性水平时,首先利用  $p$  值计算出  $t$  值或  $z$  值,然后利用公式(b)或(d)计算效应大小。

第六种方法:当原始研究汇报的是不显著的关系,且没有其他有效信息可以计算  $t$  值或  $z$  值时,将效应大小直接赋值 0。

## (三) 调节变量的选择

在了解社会救助与就业总体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可能还想进一步了解以往的研究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及为什么在关系显著性、关系方向、关系强弱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此,本研究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具体综合有关福利依赖的各个实证研究的特征,从四个方面识别出了 9 个潜在的调节因素(即导致现有探讨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不同实证结果的影响因素):数据方面(包括是否使用面板数据、是否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是否使用城

市样本、数据收集的时间)、变量方面(包括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就业的测量方式)、模型方面(是否使用匹配方法)、文章方面(包括文章发表时间、期刊学科类别)。

### 1. 是否使用面板数据

大部分符合本研究元分析的文献使用的是截面数据<sup>[42-44]</sup>,也有一些文献使用了面板数据<sup>[14][20]</sup>。相较于截面数据,面板数据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面板数据可以追踪不同时间下的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可以控制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变量<sup>[39][45]</sup>。以往的元分析中,使用截面数据还是面板数据往往成为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sup>[45]</sup>。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可能因研究使用数据类型不同而不同,因此本研究将是否面板数据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0=否,1=是。

### 2. 是否全国代表性样本

大部分采用元分析方法的研究使用的是全国代表性样本,比如孙婧芳使用中国收入分配调查数据<sup>[46]</sup>,李睿等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sup>[47]</sup>,韩华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sup>[14]</sup>;也有一些研究使用了某个或某些地区的样本<sup>[5][18][43]</sup>。使用样本存在差异可能导致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不同,因此本研究将是否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0=否,1=是。

### 3. 是否城市样本

尽管近年来政府在缩小城乡各方面差距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成效,但是在某些方面,城乡差距依然比较明显。在研究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时,有的文献使用了农村样本<sup>[11][14][20]</sup>,有的文献使用了城市样本<sup>[5][25][44]</sup>,还有少数研究将城乡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sup>[13][43][48]</sup>。考虑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差异,使用样本的城乡地区类型不同可能会使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不同,因此本研究将样本类型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0=农村样本,1=城市样本,2=城乡合并样本。

### 4. 数据收集时间

在研究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时,学者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年份。在纳入本研究元分析的文献中,数据收集最早的时间是2002年<sup>[49]</sup>,数据收集最晚的时间是2018年<sup>[18]</sup>。在这17年中,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救助制度也日益走向规范成熟。一方面,救助标准和待遇水平的逐步提高可能会加剧福利依赖;另一方面,社会救助的就业发展导向日益明确可能会抑制福利依赖。综合来看,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很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数据收集时间是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

### 5. 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

尽管关于福利依赖的实证研究基本上考察的是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但是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测量社会救助和就业这两个关键变量。其中衡量社会救助的常用指标包括是否享受低保<sup>[14][20][46]</sup>、享受低保的时间<sup>[21][25][50]</sup>、低保金的额度<sup>[5][13][43]</sup>、采用专项救助的数量<sup>[44]</sup>,还有研究采用福利依赖心理指数<sup>[4]</sup>、救助满意程度<sup>[5]</sup>、是否预期未来有更多政府救助<sup>[13]</sup>等衡量社会救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很可能会影响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因此将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1=是否享受低保(包括是否享受低保、低保覆盖面),2=享受低保时间,3=享受低保数额(包括个人救助收入占比、人均救助收入、低保标准、家庭救助收入占比、月低保金),4=专项救助(包括专项救助项目总数、人均专项救助数量、低保外补贴数额、是否享受医疗救助、是否享受教育救助、是否享受住房救助、是否享受低保配套项目),5=其他(包括救助满意度、福利依赖心理指数、是否预期未来更多政府救助等)。

### 6. 就业的测量方式

福利依赖的实证分析文章中,关于就业的测量

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常用的测量指标包括就业意愿<sup>[10][11][47]</sup>和就业状态<sup>[13][14][43]</sup>,也有一些研究使用工作时长<sup>[48-49]</sup>、工资额度<sup>[46]</sup>、求职强度来衡量就业<sup>[21]</sup>。就业的测量方式有可能会影响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因此将就业的测量方式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1=就业意愿,2=就业状态(包括是否就业、是否寻找工作、家庭就业率、地区就业率),3=工作时长,4=工资额度,5=其他(求职强度、退出低保的风险等)<sup>③</sup>。

### 7. 是否使用匹配方法

在探讨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文章中,一个很常见的做法是比较接受社会救助和没有接受社会救助的人群在就业方面的差异。若接受社会救助的人在就业方面表现更不好,则表明社会救助与就业负相关,福利依赖一定程度上存在。然而,数据分析中,接受社会救助与没有接受社会救助的人群在基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困难及需求等方面与没有接受社会救助的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又会影响就业状况,此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等匹配方法能获得较为稳健、有效、精确的估计结果。但现有的文献中,仅有少数文献使用了匹配之后的数据进行分析<sup>[14][17]</sup>,大部分文献没有考虑匹配的问题<sup>[47][51-52]</sup>,这也会导致最终估计结果的差异。因此将是否使用匹配方法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0=否,1=是。

### 8. 文章发表时间

纳入本研究元分析的文献中,最早的文献发表在2006年<sup>[4]</sup>,最晚的文献发表在2021年<sup>[46-47][49]</sup>。一方面,文章发表距离现在越近,使用的样本和数据有可能越新;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和演进,文章发表时间距离现在越近,文章使用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越复杂和精确。因而,发表时间不同也会导致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有差异。由此,将文章发表时间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

### 9. 期刊学科类别

福利依赖是一个多学科都在参与探讨的问题,实证分析这一问题的文章,既有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上的<sup>[5][14][25]</sup>,也有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的<sup>[20][43][46]</sup>,还有发表在公共管理期刊上的<sup>[13][17]</sup>,此外,一些综合性期刊也会发表一些福利依赖的研究<sup>[18][53-54]</sup>。尽管学科交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方法论倾向、研究范式、写作风格等方面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同一问题的分析结果可能因学科类别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此将期刊学科类别作为一个潜在的调节变量:1=社会学类,2=经济学类,3=公共管理类,4=综合类。

### (四) 分析策略

在从样本文献中提取效应大小和调节变量等数据之后,本研究使用了R软件中“metafor”命令包进行元分析<sup>[55]</sup>。将皮尔逊相关系数作为效应大小的衡量指标,根据Card和Ringquist的建议<sup>[38-39]</sup>,首先把Pearson's r转化为Fisher's z,以解决统计上的小样本问题<sup>④</sup>,然后把经过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所得的Fisher's z形式的效应大小转换为Pearson's r,以便解读<sup>⑤</sup>。元分析中常用的主要有两个模型: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在进行元分析时,如果纳入的实证研究在数据、变量、模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是更为合适的选择,这是因为随机效应模型允许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并能将异质性纳入分析。如前所述,由于纳入本研究元分析的实证研究在数据、测量、模型、文章发表等方面的差异性也较大,因此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此外,由于实证研究往往采用不同方式测量同一变量,或者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因而从同样一个研究中可以提取出多个效应大小,此时纳入元分析的效应大小就不符合样本和数据的独立性要求,一般的随机效应模型不再适用,更合适的选择是三层随机效应模型(three-level random-effects meta-

analysis)<sup>[56]</sup>。

在具体的分析中,首先,利用三层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总体效应大小,从实证研究中提取的效应大小的权重为其方差的倒数;其次,为了解释效应大小的差异,进行单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即分别对上文识别出的9个潜在调节因素进行分析;最后,考虑到调节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将所有9个调节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之中,做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

#### 四、实证结果

在用从实证研究中识别的效应大小进行分析时,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总体效应大小表示为 $r=-0.065$ ( $z=-2.338$ , $p=0.019$ );对从实证研究中识别的效应大小在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排除极端值的影响,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总体效应大小表示为 $r=-0.070$ ( $z=-2.751$ , $p=0.006$ )。两个效应结果均表明,社会救助与就业在总体层面存在负相关关系,接受社会救助对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福利依赖存在。但需要注意的是,总体效应的系数非常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依赖在中国并不算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分析总体效应时,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Q=79271.903^{\textcircled{6}}$ , $p<0.001$ , $I^2=99.45\%^{\textcircled{7}}$ ),为了解释这种异质性,本研究从文章、数据、变量、模型四个方面识别了一些调节变

量,并进行了单变量和多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1汇报了单变量分析的结果。文章层面,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总体上并没有随着发表年份( $b=-0.008$ , $p=0.180$ )和期刊学科类别( $Q(3)=5.411^{\textcircled{8}}$ , $p=0.144$ )的变化而显著变化,但如果按照期刊的不同学科类别来看,发表在经济学类期刊上的文章更有可能呈现一个关于社会救助与就业的负向关系( $r=-0.142$ , $p=0.001$ )。四个数据层面的调节变量(是否面板数据、是否全国代表性数据、是否城市数据、数据收集年份)都没有显著地调节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 $p>0.1$ )。如果对四个数据层面的调节变量分别分组,负项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在使用截面数据、全国代表性数据、城市数据的研究中。变量层面,社会救助与就业的总体关系会随着就业测量方式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Q(4)=56.121$ , $p<0.001$ ),但不会随社会救助测量方式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Q(4)=3.849$ , $p=0.427$ )。相较于使用就业意愿、就业状态、就业持续时间、其他测量方式来衡量就业,使用工资额度来衡量就业的研究更有可能发现社会救助与就业的负向关系。模型层面,是否使用匹配方法并没有显著地调节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 $Q(1)=0.258$ , $p=0.612$ ),但分组来看相较于使用匹配方法的研究,未使用匹配方法的研究更有可能发现社会救助与就业的负向关系。

表1 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单因素调节效应分析

| 调节变量                               | k   | r 或 b            | z      | p     | 95% CI          |
|------------------------------------|-----|------------------|--------|-------|-----------------|
| 总体效应大小(原始数据)                       | 197 | $r=-0.065^{***}$ | -2.338 | 0.019 | [-0.119,-0.011] |
| 总体效应大小(剔除极端值)                      | 197 | $r=-0.070^{**}$  | -2.751 | 0.006 | [-0.120,-0.020] |
| 文章方面                               |     |                  |        |       |                 |
| 文章发表时间                             | 197 | $b=-0.008$       | -1.340 | 0.180 | [-0.020,0.004]  |
| 期刊学科类别( $Q(3)=5.411$ , $p=0.144$ ) |     |                  |        |       |                 |
| 社会学类                               | 96  | $r=-0.015$       | -0.406 | 0.685 | [-0.089,0.059]  |
| 经济学类                               | 62  | $r=-0.142^{***}$ | -3.413 | 0.001 | [-0.221,-0.061] |
| 公共管理类                              | 13  | $r=-0.035$       | -0.442 | 0.658 | [-0.190,0.121]  |

续表 1

| 调节变量                           | k   | r 或 b       | z      | p     | 95% CI          |
|--------------------------------|-----|-------------|--------|-------|-----------------|
| 综合类                            | 26  | r=-0.088    | -1.578 | 0.115 | [-0.195,0.021]  |
| 数据方面                           |     |             |        |       |                 |
| 是否面板数据(Q(1)= 1.463,p=0.226)    |     |             |        |       |                 |
| 否                              | 169 | r=-0.084**  | -3.032 | 0.002 | [-0.138,-0.030] |
| 是                              | 28  | r=-0.002    | -0.037 | 0.971 | [-0.123,0.118]  |
| 是否全国代表性样本(Q(1)= 0.023,p=0.880) |     |             |        |       |                 |
| 否                              | 53  | r=-0.065    | -1.625 | 0.104 | [-0.143,0.013]  |
| 是                              | 144 | r=-0.073*   | -2.152 | 0.031 | [-0.139,-0.007] |
| 是否城市样本(Q(2)= 0.786,p=0.675)    |     |             |        |       |                 |
| 农村                             | 38  | r=-0.050    | -1.045 | 0.296 | [-0.143,0.044]  |
| 城市                             | 143 | r=-0.070*   | -2.303 | 0.021 | [-0.129,-0.010] |
| 城乡结合                           | 16  | r=-0.118 ~  | -1.775 | 0.076 | [-0.245,0.012]  |
| 数据收集时间                         | 197 | b=-0.008    | -1.314 | 0.189 | [-0.020,0.004]  |
| 变量方面                           |     |             |        |       |                 |
| 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Q(4)= 3.849,p=0.427) |     |             |        |       |                 |
| 是否享受低保                         | 79  | r=-0.083*   | -2.078 | 0.038 | [-0.161,-0.005] |
| 享受低保时间                         | 17  | r=-0.155*   | -2.479 | 0.013 | [-0.273,-0.033] |
| 享受低保数额                         | 34  | r=-0.033    | -0.724 | 0.469 | [-0.122,0.057]  |
| 专项救助                           | 60  | r=-0.073    | -1.590 | 0.112 | [-0.161,0.017]  |
| 其他                             | 7   | r=-0.003    | -0.038 | 0.970 | [-0.169,0.163]  |
| 就业的测量方式(Q(4)= 56.121,p<0.001)  |     |             |        |       |                 |
| 就业意愿                           | 32  | r=-0.038    | -0.966 | 0.334 | [-0.113,0.039]  |
| 就业状态                           | 116 | r=-0.035    | -1.387 | 0.165 | [-0.084,0.144]  |
| 工作时长                           | 21  | r=-0.097 ~  | -1.928 | 0.054 | [-0.193,0.002]  |
| 工资额度                           | 16  | r=-0.446*** | -8.218 | 0.000 | [-0.532,-0.350] |
| 其他                             | 12  | r=-0.097    | -1.367 | 0.172 | [-0.233,0.042]  |
| 模型方面                           |     |             |        |       |                 |
| 是否使用匹配方法(Q(1)= 0.258,p=0.612)  |     |             |        |       |                 |
| 否                              | 166 | r=-0.076**  | -2.713 | 0.007 | [-0.130,-0.021] |
| 是                              | 31  | r=-0.044    | -0.765 | 0.444 | [-0.155,0.069]  |

注:k 代表效应大小的个数,r 代表 Pearson's r 的效应大小,b 代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95% CI 代表 95% 置信区间,z 代表 z 检验的统计值,p 代表 p 值;r 用于分类的调节变量,而 b 用于连续性调节变量;Q 后面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自由度;~ 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将所有调节变量都放进模型中,进一步分析多变量调节效应。由表 2 可知,就业的测量方式显著调节了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而其他潜在调节变量并不显著,进而单变量分析结果也得到证实。

表 2 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多因素调节效应分析

|                        | 回归系数      | 标准误    | p 值   |
|------------------------|-----------|--------|-------|
| 文章发表时间                 | 0.007     | 0.011  | 0.518 |
| 期刊学科类别(社会学类为对照组)       |           |        |       |
| 经济学类                   | -0.113    | 0.073  | 0.122 |
| 公共管理类                  | 0.099     | 0.093  | 0.287 |
| 综合类                    | -0.093    | 0.070  | 0.186 |
| 是否面板数据                 | 0.053     | 0.096  | 0.584 |
| 是否全国代表性样本              | -0.005    | 0.072  | 0.946 |
| 是否城市样本(以农村为对照组)        |           |        |       |
| 城市                     | 0.035     | 0.061  | 0.571 |
| 城乡结合                   | -0.043    | 0.082  | 0.603 |
| 数据收集时间                 | -0.013 ~  | 0.007  | 0.087 |
| 社会救助的测量方式(以是否享受低保为对照组) |           |        |       |
| 享受低保时间                 | -0.136    | 0.086  | 0.114 |
| 享受低保数额                 | -0.007    | 0.076  | 0.932 |
| 专项救助                   | -0.052    | 0.073  | 0.479 |
| 其他                     | -0.057    | 0.105  | 0.584 |
| 就业的测量方式(以就业意愿为对照组)     |           |        |       |
| 就业状态                   | -0.016    | 0.048  | 0.739 |
| 工作时长                   | -0.114    | 0.082  | 0.163 |
| 工资额度                   | -0.483*** | 0.077  | 0.000 |
| 其他                     | -0.038    | 0.123  | 0.758 |
| 是否使用匹配方法               | -0.020    | 0.095  | 0.833 |
| 常数项                    | 11.048    | 19.258 | 0.566 |

注: ~ 表示  $p<0.1$ , \*\*\* 表示  $p<0.001$ 。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是否存在  
的争论,本研究利用元分析的方法,基于筛选出的  
26 篇文献分析了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总体效应  
大小,并从数据、变量、模型、文章四个维度识别了潜  
在的调节因素,对福利依赖问题进行了反思,研究结  
论如下:其一,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总体效应为  
负值,表明接受社会救助对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中  
国福利依赖问题存在;其二,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

的总体效应较小(小于 0.1)<sup>⑨</sup>,说明中国福利依赖问  
题不是很严重,换言之,尽管社会救助在统计意义上  
对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显著性并  
不一定反映实际中的重要性或实际影响的大小;其  
三,就业的测量方式显著调节了社会救助与就业的  
关系,其他潜在调节变量并不显著,是否选择合适的  
就业测量方式对于准确评估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  
至关重要。

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

救助存在福利依赖,但依赖问题并不严重”的结论:一方面,受低保金对收入的替代效应、专项救助与低保资格的福利捆绑或叠加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社会救助一定程度上存在福利依赖的制度诱因;另一方面,考虑到社会救助制度的优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文化背景的熏陶等因素,福利依赖尚未成为中国社会救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或主要问题,而且中国社会救助的福利依赖现象不同于西方国家高福利驱动下的“懒汉”现象。随着低保精准治理的推进、收入豁免与低保渐退的实施以及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救助对象就业积极性将会明显提升。与此同时,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不断呈现出数字化、灵活化等特征,涌现出一些适合社会救助对象的就业机会能够为其提供更多脱离福利依赖的途径。此外,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强调自力更生,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这种文化背景使得人们更注重自主发展和努力工作,而不是过度依赖社会福利。

当然,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也不能忽视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大范围扩散的可能性。在本研究看来,要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需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以及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救助方面,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动专项救助与低保资格脱钩,持续优化社会救助各个项目的审核过程,积极发展社会救助,尤其是服务类救助。劳动力市场方面,政府应当努力做好配套服务,提高救助对象的就业意愿,增强其就业能力,帮助其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各级政府应关注和科学监管劳动力市场中的隐性就业、非正规就业行为,通过社会保障的数字化变革等措施促进非正规就业的正规化保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者应该关注到数据、变量、模型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样才能对不同的福利依赖研究进行科学的比较,并产生客观的认识。尽管元分析技术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化对中国社会救助中福利依赖问题的认

识,但是作为一种技术,其本身也有局限性:其一,它只能建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现有研究的质量对于元分析结果会有影响;其二,它是对现有定量研究的综合,无法将相关话题的定性研究和不能获取必要数据的定量研究纳入分析;其三,它可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但由于救助、就业等社会问题的关系通常是复杂的,并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在探讨社会救助与就业的关系的研究中,元分析只作为评估研究结果的一种方法,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和背景知识才能全面理解这些关系的本质。

#### 注释:

①在地方实践中,低保对象往往被默认为是住房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救助项目的需求者,低保资格逐渐成为享有专项救助的筛选条件。在这种捆绑式的制度设计模式下,相较于每个月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低保金,住房救助、医疗救助等专项救助的补贴更具有吸引力。

②滚雪球(Snowballing)是基于一些关键文献逐步扩大研究范围,从而获得更多文献的文献检索和筛选方法,常用于元分析中。

③用求职强度、退出低保的风险等衡量就业的实证研究较少,但也可以反映就业的状况,因而统一被归入其他这一分类。

④Pearson's  $r$  的取值范围小于 Fisher's  $z$  的取值范围。

⑤因为 Pearson's  $r$  的取值范围为-1 到 1,方便比较效应大小。

⑥ $Q$  统计量用于对效应大小的随机效应进行检验。原假设为效应大小的方差不大于样本误差,当原假设被拒绝( $p < 0.05$ ),意味着效应大小的方差不能归因于样本误差,此时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Q$  后面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⑦ $I^2$  在  $Q$  统计量的基础上,用于测量效应大小的差异幅度,其公式较为复杂,这里不再列出。基本原理是, $I^2$  越大代表越多的效应大小的方差不能归因于样本误差,此时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

⑧此处的  $Q$  统计量主要用于检验效应大小在各个调节变量的不同类别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期刊学科类别  $Q(3) = 5.411, p = 0.144$ , 说明总体上社会救助与就业关系的效应大小在不同期刊学科类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⑨一般情况下 0.1、0.3、0.5 被认为是较小效应、中等效应、较大效应的分界值。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是, 2022(10): 4-9.

[2] MURRAY C.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43-45.

[3] 李凡华. “低保”标准并非越高越好[N]. 中国社会报, 2000-8-18(003).

[4] 慈勤英, 王卓祺. 失业者的再就业选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微观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6(3): 135-150.

[5] 韩克庆, 郑瑜. “福利依赖”是否存在?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实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2, 27(2): 149-167.

[6] 张浩森. 救助、就业与福利依赖——兼论关于中国低保制度“养懒汉”的担忧[J]. 兰州学刊, 2014(5): 163-169.

[7] 刘璐婵, 林闽钢. “养懒汉”是否存在? ——城市低保制度中“福利依赖”问题研究[J]. 东岳论丛, 2015, 36(10): 37-42.

[8] ROBERT M.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U. S. welfare system: A review[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2, 30(1): 1-61.

[9] GOTTSCHALK P, MOFFITT R A. Welfare dependence: Concepts, measures, and trend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2): 38-42.

[10] 王欣. 北京市就业困难群体再就业促进的研究——基于求职意向及求职行为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1(2): 52-55.

[11] 王增文. 农村社会救助群体再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2(6): 64-71.

[12] 慈勤英, 兰剑. “福利”与“反福利依赖”——基于城市低保群体的失业与再就业行为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68(4): 111-119.

[13] 姚建平. 多元视角下的城乡低收入家庭就业状况研

究[J]. 社会保障评论, 2017, 1(2): 88-101.

[14] 韩华为. 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 ——基于 CFPS 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人口学刊, 2019, 41(6): 89-102.

[15] 蓝云曦, 周昌祥.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福利依赖与反福利依赖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8): 467-472.

[16] 洪大用. 当道义变成制度之后——试论城市低保制度实践的延伸效果及其演进方向[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3): 16-25.

[17] 王增文, 邓大松. 倾向度匹配、救助依赖与瞄准机制——基于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效应的经验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 9(2): 83-88.

[18] 冯帆. 福利给予、就业促进与低保人群的再就业[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11): 47-52.

[19] 刘一伟. “错位”还是“精准”: 最低生活保障与农户多维贫困[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4): 109-115.

[20] 孙伯驰, 段志民. 农村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J]. 财政研究, 2020(2): 113-128.

[21] 黄晨熹. 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以上海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7(1): 137-160.

[22] 徐月宾, 张秀兰. 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 东岳论丛, 2009(2): 32-37.

[23] 乔世东. 城市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济南市为例[J]. 东岳论丛, 2009, 30(10): 34-38.

[24] 崔凤, 杜瑶.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身份化”探析[J]. 江海学刊, 2010(6): 135-139.

[25] 肖萌, 李飞跃. 工作还是依赖? ——低保对象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 2017, 39(1): 102-112.

[26] 肖萌, 陈虹霖, 李飞跃. 低保对象为何退保? 动态分析策略下的退保模式及其变迁趋势研究[J]. 社会, 2019, 39(4): 210-240.

[27] XU Y, CARRARO L. Minimum income programme and welfare dependency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7, 26(2): 141-150.

[28] 马爽. 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2(5): 183-194.

[29] 陈泽群. “低保养懒人!”: 由指控低保户而显露出的福利体制问题[J]. 社会保障研究(北京), 2007(1): 128-136.

[30] LEI J, CHAN C K. Does China's public assistance scheme create welfare dependency? An assessment of the welfare of the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guarantee[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19, 62(2): 487-501.

[31] 彭宅文.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救助对象的劳动激励: “中国式福利依赖”及其调整[J]. 社会保障研究, 2009(2): 163-174.

[32] 高功敬, 高灵芝. 城市低保的历史性质与福利依赖[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3): 114-127.

[33] GAO Q, ZHAI F, YANG S. et al. Does welfare enable family expenditures on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4: 219-231.

[34] 慈勤英. 失业者社会援助与再就业的选择——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4): 67-72.

[35] 万国威.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战略转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1): 15-22.

[36] 刘璐婵. “福利依赖”概念的建构逻辑——兼论中国“福利依赖”概念的选择[J]. 天府新论, 2016(1): 101-109.

[37] YANG Y, LIU P. Are conservatives more charitable than liberals in the U. S.? A meta-analysis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haritable giving[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1, 99(1): 102598.

[38] CARD N A. Applied meta-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M].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7.

[39] RINGQUIST E J. Meta-analysis for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M]. San Francisco: John Wiley & Sons, 2013.

[40] STANLEY T D. Wheat from chaff: Meta-analysis as quantitative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3): 131-150.

[41] TONG G, GUO G. Meta-analysis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Power and heterogeneity[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22, 51(2): 566-604.

[42] 兰剑, 慈勤英. 促进就业抑或强化“福利依赖”? ——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证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2(3): 36-44.

[43] 侯斌. 从救助到就业: 发展型救助视角下城乡失业贫困人口的就就业影响研究[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95-106.

[44] 安超. 退出低保: 基于社会救助功能变迁的分析[J]. 社会发展研究, 2021, 8(04): 58-80.

[45] HUNG C, HAGER M A. The impact of revenue diversification on nonprofit financial health: A meta-analysi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9, 48(1): 5-27.

[46] 孙婧芳. 城镇低保中错保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1, 23(03): 48-62.

[47] 李睿, 邓洋, 冯颖琪, 等.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J]. 西部论坛, 2021, 31(2): 77-88.

[48] 吴敏. 低收入家庭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 2020(8): 40-54.

[49] 文雯.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兼有消费改善与劳动供给激励效应吗?[J]. 上海经济研究, 2021(2): 36-47.

[50] 张强, 慈勤英. “成家”会促使“就业”吗——婚姻对城市低保对象就业行为的影响[J]. 南方人口, 2019, 34(1): 21-30.

[51] 殷俊, 谢沁怡. 贫困是“被迫的”还是“选择的”? ——基于农村低保群体的就业意愿分析[J]. 新疆社会科学, 2017(6): 166-173.

[52] 王荣成, 杨子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城镇低收入青年劳动力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8): 57-63.

[53] 兰剑, 慈勤英. 促进就业抑或强化“福利依赖”? ——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证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2(3): 36-44.

[54] 王荣成, 刘宝臣. 就业促进政策能提高城镇困难家庭的就业参与吗?[J]. 学习与实践, 2018(12): 91-102.

[55] VIECHTBAUER W. Conducting meta-analyses in R with the metafor package[J].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2010, 36(3): 1-48.

[56] ASSINK M, WIBBELINK C J. Fitting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models in R: A step-by-step tutorial[J].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Psychology, 2016, 12(3): 154-174.